

编辑故事

爆竹一声除旧岁，桃符万户迎新年。2025年1月底至2月初，正是农历新春之际，用一句老少皆知的春联祝福《文艺报》“编辑故事”版的所有读者和作者：

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



徐海

也是奇怪，甲辰冬和乙巳春交替之际，出现了不多见的冬天不冷、春天不暖的反常现象。过去的这个冬天风和日丽，冰、冻、雨、雪都不见了踪影。一月初，在北京一年一度的图书订货会上，遇到的北京朋友都看似问我、实则自言自语地问道：“雪呢？”而来自南方的我则不但未见到雪，连霜都没有见到。但春节长假刚过，人们急切地在“立春”后盼春时，却盼到了“春寒”：江南地区最低气温迅速降到了零下8℃。寒风凛冽，扑面而来。

本期作者，我巧合地请到了两位“名士”编辑——浙江的赵波和河南的耿相新。约完、读完两篇佳作，在寒夜中的我真有“暖风不知主编辑醉，直把杭州当汴州”的感觉。

赵波是我新年约稿的第一位名编，现系浙江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我和赵波相识有5年多了，见面次数不少。刚结识他时，他还是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出版部的副主任。赵波举手投足间有女士风范，判断力、写作力极强。“浙江宣传”是浙江省委宣传部近年来打造的公众号，所发文章要求清新悦目地“说人话”（这个口号当然使许多其他的官方公众号躺枪），赵波是这个公众号的核心写手之一。通过赵波在“说人话”的“浙江宣传”公众号上和他的自媒体上的文章，我认识了“名士”风范以外的另一个“赵波”。我后来多次建议赵波到出版社、最好是浙江人民出版社去做总编辑，果然如愿。一年多前，他就任浙江人民出版社总编辑。从赵波今天发我的文章，我看到了第三个“赵波”：一个年轻时曾驰骋于网络、昏天黑地的故事写作高手。

耿相新原任中原传媒和河南人民出版社总编辑，也是一副名士派头，潇洒的长发极具艺术家魅力。如果不是先知道头衔，仅知道他是我同行的话，我一定会认为他是河南美术出版社的社长或总编辑。

我和耿总共同参加过一些会议，也同台“献过艺”“说过人话”，深知他的出版理念和眼光深度，但河南出版同行与长三角出版同行交往较少（至少于我是如此），我对他的出版经历知之不多，两人几无交流。同样在今年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我们在同一个酒店早餐时偶遇，相谈甚欢，我即当面约稿。蒙耿总爽应，我便隔三岔五地暗示他交稿，即使春节也没有放过他。

耿总的这篇文章，深入和盘托出了大象出版社是如何从一个仅做教材教辅的出版社变成教育与学术出版辉映的出版社的秘密，谈到了如何从出版一本图书到做出数量庞大的重大学术出版工程的经验。当清晨收到他的稿件时，我激动地回了他8个字：“字字珠玑，句句有用。”

作为一个2002年入职出版社的编辑，入行也算久了。编辑的本职工作是帮人出书，属于替人作嫁衣的。图书市场这个大舞台，最璀璨的光芒肯定是聚焦在作者身上的；而编辑只能躲在幕后，不能喧宾夺主。读者看了一本书，可能会产生冲动意见作者，但不会疯狂地要去见那本书的责任编辑。套用钱锺书的话说，觉得这个鸡蛋好吃，想见那只下蛋的母鸡还是可理解的，要去见那个垒鸡窝的人就有点不可救药了。

可出身于中文系，我身上总有一股创造的冲动，四年学术科班训练的折磨，常年柴米油盐的繁琐，都磨不去这股劲。看创作的舞台上，人头攒动，便也想趁着幕后冲出来，唱两句，舞两段。这便是一个编辑的写作梦。有时，我还常有这么个歪理——一个不想当作家的编辑不是个好编辑。

我最早进的是教育出版社，干的是小学语文教科书的编辑，整整十年，日复一日跟拼音字母和那一千个常用字较劲。这活，但凡高中毕业，认真负责点，都能干得好。我痛感年华虚度，但又无力挣扎。就这样，偶然间混到了天涯社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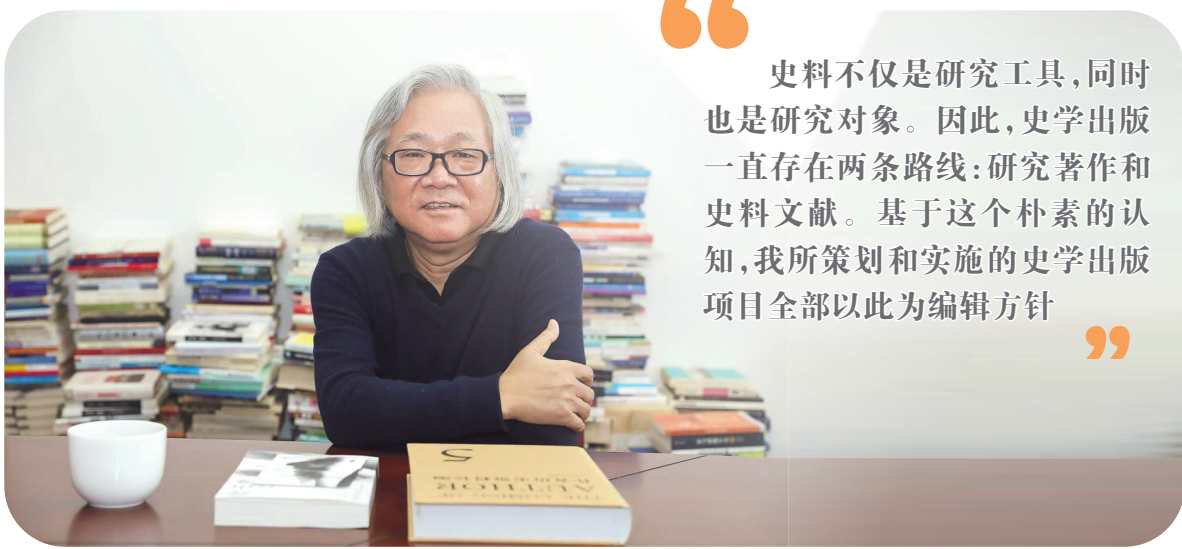
天涯那确实藏龙卧虎，煮酒论块是专攻大众历史写作的，一群历史票友在里头纵横古今。那时赫连勃勃大王是台柱子，后来当年明月风头更劲，都是在那里连载自己的文章。我选择了南北朝，以北魏、北齐、梁（陈）的人物和故事作为切口，写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还自作聪明地认为这是中国的第二个三国鼎立时期，取了个名字叫《后三国风云》。以我当时的市场感觉看，以为日后能大卖，

天涯那确实藏龙卧虎，煮酒论块是专攻大众历史写作的，一群历史票友在里头纵横古今。那时赫连勃勃大王是台柱子，后来当年明月风头更劲，都是在那里连载自己的文章。我选择了南北朝，以北魏、北齐、梁（陈）的人物和故事作为切口，写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还自作聪明地认为这是中国的第二个三国鼎立时期，取了个名字叫《后三国风云》。以我当时的市场感觉看，以为日后能大卖，

史料文献出版如何“竭泽而渔”？

——我的大型文献出版之路

□耿相新



史料不仅是研究工具，同时也是研究对象。因此，史学出版一直存在两条路线：研究著作和史料文献。基于这个朴素的认知，我所策划和实施的史学出版项目全部以此为编辑方针

的大型文献出版项目还有：《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此书被列为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共415册，已出版第一辑103册、第二辑172册、第三辑140册；《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丛》，共300册，已出版第一辑44册、第二辑22册。

在与清史编纂委员会文丛组的密切交流中，我日益认识到史料文献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而从出版的视角看，我顿悟到大型史料文献项目不仅具有长久的学术生命力和独特价值，而且还能够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在中小学教材研发基本告一段落，我遂将精力移向学术出版。2003年8月，我首先与王世襄先生签了一份《清代匠作则例》（4册）的合同，接着开始到国家图书馆考察历代地图和明清方志，但我花费精力最多的则是研究民国书籍与期刊。对于选题策划，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即如果想出版某一领域的书籍，自己首先要成为这一领域的观察家或者研究专家。当时，以往历史文献学的学术训练大大助力了我对民国书籍史的研究，我购买了包括《民国时期总书目》在内的几乎所有的书目类书籍，并对这批资料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和对比研究。我发现此一时期的“基础史料”尚缺乏系统的整理，大量的“罕见史料”未见公布，而现存的史料文献实物已经十分罕见并不具备借阅条件，一触即碎。在此背景下，我以“竭泽而渔”的材料观为指导，决定出版一套大型的超越前人的《民国史料丛刊》。2005年盛夏的一天，我坐在张研大姐办公室的窗台上，将这一大胆想法告诉她并请她来担任主编，她笑了笑，爽朗地答应了，但她提出邀请孙燕京大姐与她一起主编，对此，我当然求之不得。这套32开1128册的《民国史料丛刊》2009年出版后，在清史所一直流传着一个趣闻，说是大象出版社的耿相新总编辑敢想，张研老师敢干。在此，我还必须提到一位朋友欧剑，欧剑总编辑所在的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引进了国内第一条数字印刷生产线，我在董铁鹰社长的引领下参观之后，遂请求能否按需印刷这套11.28万册的《民国史料丛刊》，董社长和欧剑总编辑当即表示，即便是克服精装的重重困难也要高质量完成承诺。事后我才知道，这套书是国内按需印刷技术生产的第一次大规模应用，换句话说，这套书在国内数字印刷史上具有规模化的首印地位。此套书出版后，在国内外大学、研

究机构及图书业界产生了很大反响，出口的套数占到了全部销售的1/9，被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等机构购藏。积累了操作大型文献出版项目的经验后，大象出版社又陆续出版了《民国史料丛刊续编》（1140册）、《民国教育史料丛刊》（1120册）、《民国艺术史料丛刊》（436册）、《中国抗日战争史料丛刊》（1037册）。这些项目构成了大象出版社的重大出版工程群主干，同时也成为中国学术“走出去”的重要力量。

实施重大出版项目犹如大兵团作战，不仅需要一个个总负责人做最后的决策者，还需要各环节的具体操作单元有效有序配合。通过主持实施几个重大项目，我摸索和总结出了一些出版规律和技巧。如史料文献类选题选定要在全球史视野里体现中国学术特色，要以细分专题为方向，所收专题内容要尽可能“一网打尽”，内容编纂体例要具有系统性、完整性、实用性；大型史料文献项目的策划和规划要与国家“五年”规划、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和重大项目、国家出版基金、古籍整理出版基金等接轨，充分体现国家价值导向，回应重大关切和学术热点；在出版环节上要密切关注数字出版技术的发展，要充分利用数字印刷技术、数据库技术、智能编校技术、融媒出版技术，探索按需印刷、按需出版新模式。

2011年9月我调任上市公司大地传媒总编辑，并于2015年底兼任河南人民出版社总编辑，2020年初任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总编辑，在此期间我还独立策划、主持和实施了一系列的大型史料文献出版项目，如《历代全集丛刊》（13种93册）、《民国专题史丛书》（325种）、《中国近代文献丛刊》（诗歌卷、散文卷、戏剧卷、小说卷400册）、《中国地方志分类史料丛刊》（1663册）、《玄奘全集》（53册）等。值得欣慰的是，无一例外，这些大型史料文献出版项目，也都数量不一地入藏海外的大学图书馆。

时代造就出版，出版回馈时代。因为数字印刷技术，大型史料文献得以登上出版舞台。因为大学时代文献学研读的梦想未能实现，由此自我激励以出版大型史料文献为志业。因为甘愿做学术的垫脚石，我回馈了些许我在场的这个时代。回望40年，我要感谢我的恩师和时代给予我的恩赐。

（作者系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原总编辑）

一个编辑的写作梦

□赵波

因为从古至今没人写过这样的选题。但后来事实上打了脸，大部分读者对南北朝历史都模糊不清，你又闭门造车自创了一个“后三国”概念，那更是云里雾里。认定方向后，我便大量购买相关书籍，囤积了《资治通鉴》《北史》《南史》等一批史料著作，加起来有百十来本了。

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天写2000字，天涯上的网友每天会催促你更新，这里也是写作的动力。白天，昏头昏脑地在单位里跟“a.o.e”死磕；晚上回到书房，便进入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这种冲突的撕裂感还是很强烈的。

每天都是晚上8点开始写作，常规是到12点，晚点也会磨到凌晨1点。每天笔耕2000字，除特殊情况外，几乎雷打不动。每次写完，便到阳台上小坐。我家在17楼，四周并无高楼，能俯瞰到整个滨江。那时万家灯火已灭，夜静寂，深沉得和我笔下的那段历史一样，根本看不到光亮。

日复一日，共写了60万字。写到了十来万字的时候，磨铁的一个编辑便来签约了。那时的条件尚可，像我这种素人作者，都能给到首印15000册，8个点的版税。辛辛苦苦作了一年半，上下两册都出了，拿到了七八万块钱，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

不过，这一年半下来，把我写伤了。最后定稿那天，我关上书房的门，大声呼喊着，把校订完的书稿向上空扬去，纸片如雪纷纷飘落，算是跟那段沉重的时光作了郑重的告别。我感觉靠写书挣钱，养家糊口，这事大不靠谱——不是人人都有当年明月那种讲故事的天赋。我老老实实又回到编辑本行，继续充当小学生的良师益友，小心翼翼地处理他们的来信——敬爱的赵波爷爷，您责编的这本书有个地方错了，把里头的小猴画成了小狗。

到了2011年，《南方都市报》的吕卓编辑又约稿，说是要在《南方都市报》开设一个专栏，叫“公司社会”栏目，以历史为依托来讲管理，把公司组织中的一些概念，比如“职业经理人”

“CEO”等融入历史事件中去，从而给现代公司人、公司高管以启示。《南方都市报》是当时国内数一数二的都市报，影响力很大，给出的稿酬也很有诱惑，特稿千字400元。当时省里的报纸也就到千字80元。我这人格局一向不大，这种名利双收的事当然不能错过。最为关键的是，不像在天涯上写连载，天天被捆得跟阳澄湖的大闸蟹一样，毫无自由，这可以随时脱身，重返江湖。

我又重操旧业，写了《项羽之败：一己之力独扛天下，创业团队分崩离析》这样的一篇文章。后来跟其他作者的文章一起，结集成册，也是在磨铁出的，而且取了个很“磨铁”的名字——《公司就是朝廷》。这回比较幸运，既拿了报社的稿费，还能从出版商那里再拿点版税，算是一鱼两吃。

跟南都的专栏分别后，我就愈加懒得动笔了。白日里诸事繁杂，到家已是筋疲力尽、精力好时，还能翻下书；状态不好时，夜里的时间就被今日头条和短视频完全占据。写作离我的生活越来越远。这时的我，年近不惑，脾胃复生，已安心当一个编辑，离创作的梦想越来越远了。过了几年，我到了集团的行政部门工作，跟出版一线也隔膜了起来。

2022年，“浙江宣传”公众号横空出世。头条是那种时政类的大文章，二类类似于副刊风格，主要写点人文历史和地方风物。我已弃笔多年，这时又手痒了起来，开始为其供稿。我擅长的还是又文史人物，写一个人物或者某个事件，然后带出点对当下的启示。断断续续，零零散散，一两年下来大约写了40篇。一次全省文宣系统的大会，一位领导夸我的文章写得好，这让我在行业里赢了点声名。

回首我这十来年的创作史，是屡败屡战，一直行走在素人作者的边沿，离真正的作家梦很是遥远。我有个大学同学叫善水，也用业余时间搞网文创作，就熬成网文大神了，还拿了“茅盾新人奖·网络文学奖”。每个人禀赋不同，赛道不一，所以结果也不同。

作为一个出版人，为啥我老是丢不下创作的情结？因为我总觉得，唯有多写多练，自己对文字有感觉了，才能辨识好文字，约到好作家，出版好作品。这是一个编辑对文字的底线功夫

我一直认为，如果从文字的天赋感来讲，一等人搞创作，二等人搞研究，三等人搞出版。比如曹雪芹、鲁迅、张爱玲，他们的文字天赋是老天爷赏饭吃，真是的妙笔生花。而做研究的人，写起学术文章来字斟句酌、法度森严，但要写起轻巧灵动的文学作品来，就会变得四肢僵硬、动作变形。我上大学时，有个文艺理论专业的教授，学问做得极好，我一向敬重。有一日，他兴奋地捧着一堆散文请我欣赏。我快速读完，连忙恭维一番：老师，您儿子才读高中，但散文水平已露峥嵘，以后必成大家。从此，这老师就再也没理过我。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佳作不是他儿子的，是他自己呕心沥血的创作。所以文字语感的天赋就横在那里，靠后天的努力是难以跨越的，即便你能写好玄之又玄的文艺理论，却写不好家长里短的小散文。

比起学者来，出版人的文字能力更弱。在文字的天地里，出版人是眼高手低的，改起别人的文字可以大刀阔斧、纵横捭阖，一旦自己写起文字来，那很多是信屈整牙、不忍卒读的。出版人对文字最大的贡献是让作品变得“规范”，几十年修炼的是啄木鸟一样捉虫的功夫，躲在幕后还行，真到台上摆起身段来，那也是呆若木鸡的。

因为生产方式的变化，现在的编辑是职业化的，擅长于流水线生产；而过往的编辑，是专业化的，很多本身就是某个专业领域的专家。如岳麓书社的唐浩明，就从编辑《曾国藩全集》变成创作《曾国藩》历史小说的大作家了。作为一个出版人，为啥我老是丢不下创作的情结？因为我总觉得，唯有多写多练，自己对文字有感觉了，才能辨识好文字，约到好作家，出版好作品。这是一个编辑对文字的底线功夫。

当年出版《后三国风云》时，我曾给自己如此画像：“江南人，与书结缘。编辑养家糊口，写书娱人悦己，读书磨时度日。”今日虽已从一个小编成长为总编辑了，但当初的定位依然不变。出版依然是我的主业，是安身立命所在，必须全力以赴；但闲暇之余，手中那支笔依然不能放下。编辑帮别人出好书，是责无旁贷，是最硬核的实力体现，也是职业的价值所在；而编辑自己能写好书，是锦上添花，能带来别样的成就和满足。

编辑的一生，是神圣又卑微的，是热闹又寂寞的。出版的大舞台流光溢彩，万众瞩目，所有的热闹和掌声都给了作者——确实也本该如此。希望我们的编辑们，在白天做好副业杂活的同时，在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时，也能笔耕不辍，快意书写，勇敢地幕后转到台前，在低吟浅唱、眼波流转中绽放一回自己的光芒。

（作者系浙江人民出版社总编辑）